

目 录

序.....	柴泽民 (1)
抢占丰台.....	吴瑞林 (2)
回忆京郊土地改革.....	柴泽民 (6)
涿良宛地区的对敌斗争.....	马 迅 (10)
我在丰台军管分会.....	吕子敬 (18)
丰台区委机关建立前后.....	李树仁 (19)
南苑解放初期二三事.....	朱金耀 (22)
回忆丰台解放前后.....	邱 固 (25)
丰台解放纪事.....	邢锦棠 (28)
丰台镇的解放.....	吴国洋 韩长秀 (34)
接收伪宛平县政府.....	张 霖 (37)
国民党宛平县党部的垮台.....	巴松坡 高朋年 (39)
国民党宛平县政府的覆灭.....	苏兆昌 (42)
解放前后的长辛店工商业.....	刘秉德 (44)
解放时的丰台工务段.....	边开有 (48)
丰台解放当天的机务段.....	蔡耀南 (50)
回忆解放丰台片断.....	郑子清 (52)
解放军在看丹.....	王宝升 (55)
解放军占领南苑.....	吴国洋 戴立仁 (57)
丰台区划的历史沿革.....	邢锦棠 (59)

序

柴泽民

我应丰台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之约，为《纪念丰台解放四十周年》专辑写几句话，这不由使我又回忆起那已经成为历史的岁月。

当年，解放丰台的战斗，是震惊世界的“平津战役”的前奏，辽沈战役结束后，困守在平津地区的60余万国民党政府军队已十分孤立，欲从海上南逃或西窜绥远（今属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野战军入关后，会同华北军区及地方武装100余万人，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在广大人民支援下，于1948年11月29日发起“平津战役”。首先将国民党政府军分割包围于北平、天津、张家口、新保安、塘沽五个据点，截断其西窜南逃的通路。与此同时，对北平的包围圈也在逐渐缩小。为了彻底粉碎傅作义守军南逃的企图，作为北平西南门口的交通要害——丰台，已经为东北野战军的五纵队全面包围，致使驻守在这里的敌军已无路可退，惶惶不可终日。尽管傅作义早就意识到丰台战略地位的重要，因而从城内增派了不少兵力，并且配备3100多辆装甲车、坦克，加强了防御，以期达到固守的目的。但是，我军战士发动了强大的攻势，一举歼灭了这里的一部分守军后，残余溃军全部逃窜到北平城内去了。于1948年12月14日，彻底解放了丰台。同时，通县、黄村、海淀、门头沟、长辛店也随之先后解放了，使龟缩在城内的国民党军队，成了瓮中之鳖，迫使傅作义终于派出了和谈代表，加速了和平解放北平的进程。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丰台人民，迎来了黎明的曙光，他们载歌载舞，欢庆解放，这是人民的胜利。当时那种群情沸腾的场面，我迄今仍然记忆犹新。

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胜利成果，我随之负责成立和领导了西南地区军事管制委员会，会址即设在丰台火车站对面的兴隆胡同一幢二层楼里，唐凯同志任主任，我为副主任。不久，唐凯同志即随军南下，我继为主任，军管会的主要任务是接管国民党军政机关及各项设施，维护社会秩序，发动群众摧毁伪保甲，建立新政权和进行土地改革前的准备工作。军管会虽然从成立到撤离不过半年时间，但是，那一个个激烈斗争的情景，却是令我永远也不能忘怀的。后来，我虽然调到北平市委郊区工作委员会任书记，但丰台仍然是我工作的重点，也正是因为这样，使我对于丰台始终怀有深厚的感情，那是我革命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

转瞬四十年过去了，但是丰台人民没有忘记那些为了解放和建设新丰台而英勇献身和做出了卓越贡献的英雄们。在缅怀和追述英雄们可歌可泣事迹的同时，由区政协组织一些曾参加丰台解放战斗的老同志，撰写了回忆的文章。通过这些亲历的文章，再现了那一段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正是这些英雄的业绩，鼓舞着丰台人民，在四化建设中解放思想，开拓前进。我深为丰台人民取得的每一个胜利感到由衷的高兴。过去，丰台人民支援解放军，为建设一个新中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今天，丰台人民将会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迈出更大的一步。值此《纪念丰台解放四十周年》专辑印行之际，我谨向丰台人民表示诚挚的敬意，同时，预祝丰台人民在四化建设中，取得更辉煌的成就。

抢占丰台

吴瑞林

我于1948年12月中旬，亲自参加并指挥了解放丰台的战斗。丰台是古今兵家必争之地，是平津、平汉两大铁路的枢纽，有北平守敌最大的军用仓库。如果我们抢占了丰台，就可切断平津守敌的联系，堵死北平敌人南逃的道路，并与在东郊南进的兄弟部队共同完成对北平的战役合围。这样，北平守敌南逃与西窜的道路均被切断，傅作义的部队只有一条出路，这就是放下武器。所以丰台这个地方非常重要，国民党军队不惜重兵把守。丰台驻有王凤岗的一〇一军，装备也不错，抢占丰台这一仗，王凤岗的军队就出动一百多辆坦克。而我军仅一个师的兵力，从兵力，从装备，都远远不如敌军。所以抢占丰台这一仗是一个大仗，一个恶仗，打起来是非常艰巨的。我们一个师的兵力对付敌人一百多辆坦克的进攻，确实是罕见的。我当时是东北野战军第五纵队副司令员，带领先头部队一二四师参加抢占丰台的战斗，我把当时的情况回忆出来，供丰台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参考。

1948年11月中旬，我们部队驻在辽宁省义县，这时辽沈战役还没有结束，但已经看出我们胜利了。中央军委的一份通报有要我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的意图，根据这个意图，我们部队提前拟定了大部队长途行军计划，大意是避开京沈铁路，从辽西经喜峰口、古北口直插平津之间，昼伏夜行，隐蔽前进。

我们纵队在辽沈战役中伤亡较重，当时部队的思想工作比较好做，因为在辽沈战役中打了胜仗，乘胜进军，部队情绪高涨。当时的口号是“打下北平城，迎接党中央！”先头部队提前三天出发，主要是为部队开路，修桥、铺路、号房、做饭。11月23日，辽沈战役没有结束，我们进关西行的部队就出发了。开始几天，由于夜间隐蔽行军，天气寒冷，行军时间又长，部队过度疲劳。我们及时发现这一问题，改为拂晓和黄昏时行军，保证部队适当休息。经过十天急行军，行程千余华里，于12月3日到达了冀东三河县。到达三河后，得到了解放区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并在物资上给予了大力支援，送粮食、送猪肉，部队吃上了热饭，情绪非常高涨。

12月11日，我们第五纵队从三河县出发。部队进到怀柔县，刚过了白河，三纵队、五纵队由肖劲光组织了第一前线指挥部。肖劲光和我讲：“中央有电报，三纵不去进攻南口了，准备南下经通县插廊坊，切断平津铁路。去攻打南口切断平张敌军联系，断绝傅作义西逃后路的艰巨任务由你去执行了。”我当即接受了任务，率领部队直插南口、沙河之间。第一仗是打小汤山，这地方驻有国民党中央交警十三总队，实际是一师人。这个部队是由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组建的，任务是监视部队行动的，美械装备，由美国军官训练，在国民党军队中，是装备最好，思想最反动的军队。但多为少爷兵，没实战经验，过去在营口和交警一中队当过仗。小汤山这一仗打得很残酷，最后消灭了国民党的十六师和交警十三总队，解放

了南口镇，堵住了敌人西逃的后路。

12月12日，我部继续前进，攻打海淀温泉，但是久攻不下。早晨，我带了一个排的战士去前沿观察敌情，我趴在隐蔽处用望远镜看，看到一连串的坟头子，是敌人防御的空隙，我带这一排人插进去，很快结束了战斗。

12月13日，我带领先头师三个团已挺进到圆明园以北，红山口以东地区，准备攻打万寿山，这时刘仁同志乘吉普车来了，他问：“谁是部队首长？”当时，没有司令员，我是副司令员，我回答：“我就是，我叫吴瑞林，东北野战军第五纵队副司令员。”刘仁同志自我介绍说：“我是晋察冀城工部部长刘仁，我向你传达聂荣臻司令员指示。他要求你们占领南口以后，一定不要顾虑张家口、宣化之敌，张家口已完全为我华北解放军所包围，北平、张家口之间的宣化、新保安、康庄、花园等地也已为我杨、罗、耿兵团控制，程子华同志也已带领十一纵队参加了战斗，你们要大踏步前进，扯破敌人北平防线，抢占丰台。”我当时理解，聂司令员的指示代表中央军委，非常重要，特别是这个“抢”字分量很重。我们当即在万寿山西北一个山脚下的师指挥所里认真分析了敌情，研究了进军路线。据俘虏称，敌军在红山口的最高指挥官是营长，因此，我们决定拿下红山口，南下直取丰台。

13日下午5时许，我军一部进至红山口以东马兰洼、黑山扈一带。5时40分，天已经黑下来，师指挥所发出了攻击的信号。眨眼的功夫红山口两边的碉堡一片通红，八二迫击炮轰击敌阵地十来分钟，三七六团六连经过二十分钟战斗，便夺下敌人一个营扼守的红山口，活捉了敌营长。缴获敌人八二迫击炮三门，重机枪一挺，守敌逃往青龙桥地区，玉泉山、万寿山守敌听到枪声，也仓惶逃往北平。

我军撕破敌人防线，向田村急进。21时30分，占领田村火车站。铁路工人不知道我们是什么部队，当我们说明是人民解放军时，工人们都积极地协助。当时，正好一列火车从门头沟方向飞奔而来，工人给了红灯信号，列车一停，战士们蜂拥而上，枪口对着敌人说：“到站啦，下车吧！”敌人糊里糊涂就当俘虏。当即把敌军的枪栓拉掉放一处，枪和子弹放另一处，俘虏在一处，派一个连看管，等后续部队来收容。

部队继续前进，一个通信员汗渍渍地跑来报告说：“西面有个飞机场，还停着飞机，打不打？”这一情况提醒了我，要防止部队被眼前的俘虏、飞机、武器所吸引。我立刻告诉大家，我们现在好比到河里打鱼，抢占了丰台就如同在河里筑起了一道水闸，大鱼、小鱼、螃蟹、虾就跑不了啦！因此，有利于抢占丰台的事就坚决干，否则就坚决放弃，一定不要因小失大。并具体规定，沿途遇到敌军，能绕过就绕过，绕不过就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段，猛打猛进，抓到俘虏一律人枪分开，就地看管起来，飞机场、火车站等都不要打，这些地方很快就会是我们的。

明月当空，我们走在平坦的大路上快步如飞。当我们来到五棵松以北的玉泉路上，忽然发现右侧有一支部队和我们并行，一辆大车流星似的从后面赶上来。我感到很奇怪，当初，为了加快行军速度，重武器和大车都留在了后边，这辆大车为什么赶在了前边呢，而且车上怎么还坐有一个妇女呢？我遂命令警卫员把大车拦住，一问，原来是敌保二旅的，上边坐的那个女人是旅长太太，右侧部队是敌保安15团的。我立刻将这一情况告诉身前的战士，要大家听候命令，一起行动。只见战士们嘴巴咬耳朵，迅速传了下去。一声令下，战士们转身扑向敌人，搂的搂，抱的抱，夺起枪来。敌人还在作梦，直着嗓子喊：“弟兄们，别误会，我们是保安15团的！”战士们回答说：“误会不了，捉的就是保安15团！”这时，吵闹声惊

动了坐在车上的女人，只见她威风凛凛从车里钻出来骂道：“你们这些丘八想造反吗？我是旅长太太！”没等他说完，七连三排长一步窜上去，骂道：“旅长太太有什么了不起。”伸手把她拖了下来。几分钟的功夫，一个团八百多人全部缴了械。

下半夜，天气突然变了，乌云密布，除了东面的北平城有几点鬼火般的光亮外，眼前一片漆黑。我们在向导老乡的引导下，仍旧快步前进。前卫营长邢嘉盛和七连连长魏同东，带领一个尖刀班走在最前面。他们刚经过城郊的一个十字路口，只见迎面驶来两辆大卡车，战士们用机枪一顿猛扫，一辆撞到电线杆上，一辆翻到路边的沟里，人车俱毁。这时候整个前卫营全赶到了，正准备继续前进，西南面又传来隆隆的马达声。瞬息间，一辆闪烁着耀眼灯光的怪物直冲过来。战士们一阵猛打，它还是不停地前进，七连四班长孙宝义首先看出是装甲车，他飞步窜上去，把手榴弹和爆破筒塞到车底下，只见红光一闪，装甲车随着一声巨响猛地跳动了一下，正好和被打坏的两辆卡车摆成一条线，把街口堵得严严的。这当儿，后面又出现了一长串装甲车和坦克，隆隆的响声震得地皮都发颤。它们来到十字路口，进不能进退不能退，急得直打转。战士们趁此机会来了个大包围，有的用枪打穿了装甲车的轮胎，有的把手榴弹、爆破筒塞进坦克的肚子里，还有人爬上车命令敌人投降，吓得敌人一个跟一个爬了出来。在这里，我军击毁敌装甲车十余辆，缴获坦克十余辆。

我军继续前进，14日早晨7时，我东北野战军五纵队三七一团、三七二团超过新北京到达沙窝，7时30分到达岳各庄，9点多钟我从岳各庄的一个大窑顶上隐约地看到淹没在雾海中的丰台。这时候，丰台北面大井的高地上，发出密集的枪声，封锁着我军前进的道路。正当我难于准确判断敌人的兵力和企图的时候，战士们送来了一个俘虏，这个家伙是一〇一军的一个营长，他以为我们是自己人，特地来联系，结果自投罗网。从他嘴里得知一〇一军只有一个多旅驻在丰台北面和镇上，主力都在西、南面，虽正在靠拢，但都没有发觉我们的行动。这些情况使我想到，应当不给敌人清醒的机会，一竿子插到底，把丰台抢到手。便立即和一二四师的同志调整了部署，急调正在吃饭的三七二团，配合三七〇团从北面猛攻丰台，同时命令身边的参谋查清有哪些部队，要他们作好充分准备，随时投入战斗。

上午10时左右，我军在丰台路口截击了丰台守敌运面粉的卡车和从长辛店、宛平城方面退却之敌的卡车。11时，我军开始攻击大井和周庄子、七里庄守敌，三七二团在攻打大井、西仓库战斗中受阻，牺牲我团政委及以下人员四十八人，伤营长及以下人员一百七十三人。14时，三七〇团接替三七二团，开始第一次冲击，经过30分钟，将敌人全部赶跑。然后，用两个团的兵力，从丰台东西两头迂回包围敌人。战斗到17时，毙伤敌人二百余人，俘六十二人，缴获轻重机枪五十挺，占领了丰台火车站和丰台东西仓库，守敌仓惶逃往镇国寺地区，我们从东西仓库获取了大量武器装备、被服及粮食。

为了策应先头部队抢占丰台，一二六师尾一二四师后跟进，一二六师三七六团到达新北京是14日7时，正遇上傅作义由宛平城撤退的后勤运输队，缴战马二十匹，俘敌一百余人。三七六团进至古庙、跑马场（靛厂东）、财神庙、莲花池一线。

一二五师随一二六师跟进，14日进至八角，古城、衙门口地区。为配合一二四师作战，进至五里店、看丹地区。12月14日这天，配合友军实现了对北平的合围。

抢占了丰台，还要能守住丰台，守比攻还难哪！我们清楚地知道，敌人一定会拼命地夺回丰台的。因此，我一面命令部队立即改造工事，布置阵地，一面亲自观察地形。我站在泥洼砖窑上（指挥所设在此），用望远镜往北平方向察看，见到戴大沿帽的敌军官也在城墙上

往丰台方向瞭望观察。我当即意识到第二天还有大仗打。而我们的兵力当时除一二四师三个团外，只有一二六师，一五五师各一个团。这就是说，我们要用现有少数兵力守住丰台，阻挡大量敌人的猛攻。当时我军防线为北起核桃园、古庙（今海淀区）、金家村、跑马场、马官营、财神庙、西局、水头庄、东管头、孟村、王家胡同、苇洼、纪家庙、张家路口、神堂一线；敌军防线北起白云观、广安门、关厢、大红庙、鸭子桥、菜户营、三路居、西铁匠营、中顶、草桥、玉泉营、镇国寺一带。

我们一到丰台，野司首长发来了特急电报，表扬我们比他们预计的时间早一天抢占了丰台，并指示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只要能奋战一天，主力即可赶到。我们立即把首长的指示向下面作了传达。战士们听说首长来电表扬了我们，情绪异常高涨。大家不顾连续行军、作战的疲劳，积极抢修工事，并从仓库里搬来缴获的武器弹药装备了自己。

丰台这个地方被我军占领以后，北平失掉了一个重要屏障。我军不仅切断了敌人经由铁路线东逃之路，且可依托丰台逐渐向北平推进，直逼广安门和右安门，成为敌据守城垣顽抗的最大威胁。根据总部的通知，傅军主力已被华北我军紧紧包围在新保安和张家口。这使傅军难于决定拼死西援，也难于抛弃起家老本而东逃。现在我们又出其意料地在敌人腹心插上一把刀，使敌人整个华北战局危在旦夕。在这样的情势下，敌人拼命与我争夺丰台，势在必行。

果然不出所料，次晨3时，以一系列装甲车为前导的敌人大批反扑部队，开始了对我军阵地的进攻。霎时间，丰台镇里里外外都响起了枪声。敌装甲车一直冲到我三七二团指挥所门前，扼守着火车站的三个营被割成了三段。三七二团的战士们被敌分割后，各自坚守在阵地，与敌反复冲杀。我们趁着夜色掩护，把预备队从敌人侧后楔进去，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早晨6时50分，敌人又组织了第二次猛攻，整师整团在装甲车掩护下，又冲向我们的阵地。我军同埠洼阵地首先被两连敌人突入，坚守在这里的第一连反复冲杀四次，最后剩下二十几个人仍然坚守阵地。广安门和大红庙鸭子桥之敌向我西局、财神庙、跑马场阵地冲击，我水口子守军将敌先头坦克击毁，堵塞了敌进攻道路，敌坦克只好绕道进攻我财神庙和跑马场阵地，被我军击退。

敌人恼羞成怒，集中六个师、上百门榴弹炮，加上坦克、装甲列车，向我军阵地发动第三次猛攻。敌人不惜大量伤亡，沿铁道分南北两路向我丰台猛扑过来。南路沿于家胡同、郑王坟、老河身，向我神堂、张家路口、纪家庙攻过来；铁路北侧由东西管头向前后泥洼进攻。下午4时30分再次向我发起进攻。敌人在南侧进到帽园，北侧进到泥洼砖窑。战斗十分激烈，敌我双方损失都很大。在这最紧急的时刻，我军十一纵队的先头师师长欧致富听到丰台激烈的枪炮声，立刻带着身边的一个团，赶来投入战斗；华北的兄弟部队也主动找到三七二团，协同他们防守丰台火车站。以后我军的后续部队也源源不断增加上来。丰台的老乡们，冒着炮火为我们抢救伤员，烧水、做饭，给予了很大的支持。经过我军民的浴血奋战，15日下午，终于打退了敌人的反扑，守住了丰台。

敌人这才清醒过来，知道解放军已打入内线，大部队已兵临城下。丰台保卫战的胜利，堵塞了敌人西逃之路，粉碎了南逃的妄想，促进了和谈的成功，是我军进军平津战略上的重要一着棋。

是役歼敌八千余人，缴获坦克一百零六辆装甲汽车二十四辆，火车头四十五个，火车皮五百零一辆，各种炮七十五门，机枪二百二十五挺，步枪一千六百六十七支，还有丰台东西

回忆京郊土地改革

柴泽民

一九四八年冬，随着解放大军向平津地区推进，我奉命随赵振声（李葆华，当时任中共北平市委副书记）同志从河北省平山出发，经涿县到京南丰台镇，先任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西南区分会副主任、后任主任，到1949年5月以后，又任中共北平市委郊区工作委员会书记，自始至终，参加京郊的土地改革工作。时至今日，虽已四十年的光景，可是许多重要情节仍历历在目。尤其是当时那种自上而下，注重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优良作风，印象尤为深刻。

一

京郊解放之初，北平这座千年文明古都，又是华北最大的城市，百废待兴，工作也是千头万绪。尤其是对郊区农村，情况不明，又面临春耕生产在即，我们这些在郊区工作的同志和驻军的指战员，对如何开展京郊的土地改革，心里没底。过去虽然在老区有一些平分土地的经验，但对大城市郊区的情况不熟悉，是照搬老区的一套办法，还是要重新制订一套新政策？思想认识很不明确。同时，在周围地区的影响下，有不少干部和贫、雇农，也普遍出现了急于要求分的情绪。如果仓促进行土地改革，轻易变动土地关系，又怕犯错误，给今后遭致严重后果。面对这些问题，根据市委的指示，首先从调查研究入手，从实际情况出发，制订新的政策，在新政策尚未颁布前，农时不待人，因此，就当时已掌握的一些情况，对农村工作提了几点意见：（一）原佃农所种的土地，仍继续由佃农耕种，地主不得夺回。（二）地主私自分给佃农或其他农民的土地，暂时可由农民接管耕种，不得荒芜，问题以后解决。（三）经

两个大仓库的大量武器、装备、被服、粮食等。

丰台这一仗刚打完，我们接到中央军委发来的电报。军委称赞我们先机夺取丰台，打得好。指示我们要坚守住阵地，粉碎敌人的反扑和突围，并相机沿着丰台通往北平的铁路线向前推进。我们立即把这令人振奋的消息传到各个部队。军委的指示给全体战士们首先抓住敌人正在后撤这一有利时机，沿着铁路向东打出去。他们把老百姓种菜的暖洞子作为依托，不断向前推进，新增援上来的炮兵团就地展开向敌轰击。部队打到哪里，哪里的铁路工人便忙着拆铁轨，不让敌人装甲车再来逞凶。这样，我们一直打到右安门外。至此整个华北敌人已被我分割包围，欲战无力，欲逃无路，摆在面前的只有放下武器。

（邢锦棠、金志中访问了吴瑞林，邢锦棠根据录音作了整理）

营地主或富农除非他们亲自耕作外，不得辞退长工；家中如遭受某种突然灾害，而无力雇佣长工者，在土地不荒芜的条件下，可以酌情处理。（四）农村的公田，可以暂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耕种，但不确定地权，待以后土改时再说，目前必须做到：土地不荒芜，农民有地种。

这个意见呈报市委后，彭真同志对我说，已经见到我的报告，他正忙于处理其它公务，让我找市委秘书长邓拓同志，邓对我说：“市委认为你们这种不违农时，不荒土地，从搞好当年农业生产出发的考虑是对头的、因此同意你们的建议”。至于如何制订郊区土改的具体方案，还求我们继续深入调查，他并表示市委政策研究室的同志也要下去参加调查研究。

二

土改前，京郊的辖区范围是现在的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门头沟五个区和大兴县的一部分。当时分为八个区（后合并为七个区），计有人口64万（其中纯农业人口为35.5万）、耕地110余万亩。我们经过调查，了解到京郊土地的占有状况与全国一般农村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也有不少自己的特点。如，京郊农村的封建土地制度是与曾经长期作为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中心相联系。在郊区，清代的某些贵族、太监以及民国以来的军阀、官僚和汉奸等仍占有大量土地。这些显贵住在北京城里坐享其成，而由其管家充当“二地主”代为收租，所以，农民所受的剥削和压迫更重。有些封建贵族保存下来的“坟奴”制度，依然存在。另外，由于北京的历史地位及其消费的需要，郊区的农业生产已呈现出商品趋势，已有果园、菜地、生产蔬菜的温室、阳畦，而且，在近郊区已出现一些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为主的果园、棉田、稻地，更有永定河两岸出产的花生、白薯，玉泉山下的荸荠，白藕和北京鸭，皆誉满京华。伴随着商品生产的是有些地方已经采用简单的机器和技术设备。有的已使用电力井、自流井、打稻机、碾米机等，从事这些商品生产，对土地不仅需要较多的资本投入，而且需要一定的科学技术条件，因此，从事这些商品生产的，多是雇工经营的地主，农业资本家和部分富农。

中共北平市委根据调查了解的实际情况，经过认真细致地分析和研究，在坚持废除封建和半封建土地制度，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的原则下，制订了符合京郊实际情况的具体政策，这就是1949年5月31日由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所颁布的《关于本市辖区农业土地问题的决定》。指出了在城市郊区，虽需要和一般农村一样废除封建与半封建的土地制度，即没收地主的土地和征收富农的出租土地，却又不能和一般农村一样实行土地平分和土地平分后的一般私有制。确定了适合北平近郊的土改政策，即没收地主土地和征收富农出租土地为国家所有，并由国家分配（不是平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使用。

三

1949年5月20日，市委为了加强对郊区工作的领导，决定成立中共北平市委郊区工作委员会，任命我为郊委书记，并任命安平生等七位同志为委员，负责郊区工作，贯彻执行京郊土改决定。经与各区委协商，每区组织一定数量的干部组成工作组，首先选一土改试验村、于6月中旬开始，到9月底结束。

通过试验村的工作，锻炼了一批骨干，了解到广大农民及其各阶层对土地政策的态度，开始时，多数贫、雇农仍有“平分土地”和土地私有的要求，经过工作组干部耐心宣传解释，一般地都能接受《决定》规定的原则。意见较大的是一部分贫农和兼营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以及无固定职业的贫民，其中有些以农为生者，真心要求多分土地；有些并非以农为生，也不会种地的要求土地私有，平分土地后再转手出卖。为了适当满足一部分贫农和雇工的土地要求，我们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作了一些补充规定，具体情况具体处理，基本上解决了广大无地和少地贫、雇农的土地要求。

在进行试点、检验和完善政策的同时，我们自上而下地作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培训干部，掌握政策，统一认识，以加强党对土改工作的政治领导，我们从六月开始，即以区为单位举办短训班，除准备参加土改工作的区、村干部，还有农民中的积极分子，普遍学习两个文件：《关于本市辖区农业土地问题的决定》和《怎样划分阶级》。使广大农民及其他各阶层逐步明白我党在京郊即将实行土改的意义、政策和工作法。特别是对于农民群众中所存在的疑难问题与不同意见耐心倾听，而后以协商的态度，说服的方法进行恰当的解决。这一切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之后，郊区的秋收种麦工作也已结束，正是进行全面土改工作的好时机。于是，我们根据试点村的经验及各区干部的力量，拟定了规划，做到不违农时，争取在来年春耕生产开始前结束。京郊土改在郊区土改正式开始以前，于1949年10月12日，由市委郊委召开了郊区扩大干部会议，由我代表郊委向来自郊区的七百多名干部，正式布置了土改工作，市委书记彭真同志到会作了重要报告。他开宗明义：“现在要在郊区动手消灭封建了，在人民的首都，是不允许封建势力存在的，消灭封建势力，首先就是要实行土地改革，因为土地就是封建势力的根。”他还明确指出了：“土改的目的，就是要发展生产，只讲四句话，即自己动手，打倒封建，分配土地，发展生产。”

从当年10月中旬开始，分三批进行。第一批村镇，用了两个月，二批和三批村镇，各用了半个月，到1950年3月底，即春耕生产开始前，全郊区即胜利完成了土改任务。

四

鉴于过去在老区土改的经验教训，我们在掌握郊区土改的工作中，始终坚持政策，发现偏向，及时纠正。工作组进村后，首先公开向一切人（包括地主在内）说明来意，不搞神秘主义，告诉人们，党和政府的政策是什么。并警告地主主要遵守人民政府的政策和法令。这样作，既能迅速地动员农民进行土改，又能安定一般人（包括地主）的恐惧心理。然后再根据村中多数农民当前最迫切的要求，去确定第一个具体入手的工作。村中有恶霸的发动群众斗恶霸，没有恶霸的就解决群众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郊区土改中一共斗争了130个恶霸其中有40名交法院处理。我当时兼任郊区土改法院院长，经手处理这些案件。这40名恶霸中，判处死刑者7人，判处无期徒刑者1人，其余均判处有期徒刑。这样一来，长了农民的志气，灭了地主阶级的威风，一般地主也不敢抗拒土改了。在民主评定阶级中，采取自报公议的方法，划谁谁到场，先由自己报成分，再由群众评定，如本人不同意，可以当场申辩并可向政府申诉。这样可以当场弄清情况，摆出根据，使被划者口服心服，并且从与地主的辩论中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在完成这两个工作的基础上，我们根据《决定》的原则分配土地和其他斗争果实。我们就是这样通过工作组，有领导地发动群众，把政策交给群众，让群众用

政策的威力，去完成这一反封建的伟大历史任务，使土改这场复杂的斗争成为有领导、有组织的革命运动。

当然，像这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环境生疏，条件复杂，干部来自四面八方，经历和素质参差不齐，要保证不出一·点偏差是很难的。市委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对我们严格要求，发现问题及时纠正，绝不能使之传播蔓延。有一次，某村一个地主自杀，市委得到汇报后，彭真和赵振声同志立即把我叫去进行批评，要求严格执行政策。此后，郊委为了及时掌握情况，加强对土改工作的指导，除给各区区委，工作组规定严格的请示、汇报制度，还配备一批巡视员，骑着自行车，经常直接到各村了解情况，检查工作，与领导机关保持直接联系，使领导能及时了解情况，好的经验能迅速推广，出了偏差也能及时纠正。

在运动过程中，最容易发生的问题，是对斗争对象采取直接行动，即动手打人。虽然我们三令五申，严禁乱打乱杀，可是在斗争会上，居然仍有工作队员带头打人的现象。郊委发现后，及时进行通报批评，并对工作组长进行处分，从而制止了打人捆人之风的蔓延。另一个容易出偏差的问题，就是错划和“提高”一些人的成分。郊区划分阶级中争执最多的是“主要劳动”和“附带劳动”的区别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最难区分的是在园艺方面。园艺中有多种多样的劳动，有不少园主除雇用工人外，自己和家人则参加浇水、除草、割草和上市推销产品等，这些劳动是园艺中不可缺少的，又是常年的，应视为主要劳动。可是有些工作组未能掌握这一精神，在一些村把不少富农错划成地主，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郊区农村杂居一部分非农业人口。另有一些家住城里而在郊区占有少量土地的居民，如果按一般农村划分阶级的观点来看待他们，不从大城市郊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就会把这些应该划分为“小土地出租者”和“资本家兼地主”的人，错划成地主和富农，以致把朋友变成敌人，增加了土改阻力。在第一批土改中，很多村子犯了这个错误。后来，我们根据中共中央华北局1948年12月《关于阳泉市土改划分阶级的指示》，普遍进行了检查，及时纠正过来，群众反映良好。事实证明，无论是制定政策或执行政策中发生偏差，只要勇于纠正及时纠正，不仅无损于党的威信，而且会使党的威信更加提高，使工作更加顺利地发展。反之，如果掩掩盖盖、文过饰非，听之任之，即会酿成更大的恶果。

五

京郊的土地改革，由于是在党的坚强领导和正确政策指引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地充分发动群众进行的，所以到1950年3月底即胜利完成了。在这场斗争中，京郊的二十多万无地和少地的贫、雇农，分得了近四十万亩国有地；当他们领到人民政府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时，高兴地说：“私凭文书官凭印，有了这个种地就踏实了！”他们还分得一批耕畜、农具、种子和口粮，在新生的土地上，播下了幸福的种子，积极响应市人民政府“增产一成”的号召，投入了爱国增产运动。

中农看到对富农“原耕原用不动”，发展生产的劲头起来了。有些中农在本村土改一结束，就添置牲口和大车，搞积肥备耕。有些中农扩大菜地，人手不够，还雇了长工和短工。他们高兴地说：“政府号召我们发展生产，允许雇工、富农都不动、我们还顾虑什么！”

一些富农、经营地主和农业资本家，他们经营的土地，虽然所有权有所变动，但按政策仍维持“原耕原用不动”，可以继续雇工经营，所以有些人还积极增添设备，扩大生产规模。

涿、良、宛地区对敌斗争情况

马 迅

1943年秋，为了开辟永定河以北这块敌人严密控制的敌占区，使抗日工作不断向敌人心脏发展，在十地委的领导下，选派精干的党员干部和武装力量，秘密地进入了这一地区，成立了平南办事处。党委书记是苏玉振，办事处主任是刘广钰，军事部长是刘玉甫，敌工部长是徐灏。

1944年10月，又根据对敌斗争形势的需要，把平南办事处改组为平南县委和平南县政府（含涿县、良乡、宛平、大兴、安次、房山、永清等县的部分或全部地区）。苏玉振任县委书记，阎占彭任县长，刘浩任组织部长，徐灏任敌工部长，组成县委会，领导这一地区的抗日斗争。

1945年初，冀中十地委根据平南地区抗日工作发展的需要，决定把平南县划为两个县，东半部原大兴县的全部及安次县的西北部地区划为大兴县，西半部包括涿县、良乡平汉铁路以东以南地区，宛平县卢沟桥以南地区，加上固安县永定河以北的大小泃堤一带数十个村庄，划为涿良宛联合县。涿良宛联合县的县委书记是刘浩，县长是我，县大队长是支广西，县大队副政委是石明，组织部长是李允忠，敌工部长是王彬，宣传部长是陈宗琪，组成县委员会。

1946年初，十地委为了进一步加强领导，决定将涿良宛联合县分别划为涿县、良乡、宛平三县。我和刘浩就到了宛平县，仍是他的县委书记，我的县长，组织部长是华黎，宣传部长是李川，县大队长是张贝珍，县大队政委是李润波，敌工部长是王少彬，共同主持那里的工作；涿县的县委书记是于群，县长是李景森，良乡县委书记是宋浩，县长是陈震。

当时，宛平县政府设在京南第一镇庞各庄，下设六个区。北宁路以北，永定河以南一

尤其是经营温室蔬菜、果园和奶牛业者，随着城市需要量的增长，而得到更快的发展。到1952年，即土改后的第三年，京郊的农业生产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势头，尤其在园艺方面，由于在土改中保护了先进技术设施，成果最为明显。1952年的秋天，郊区的菜田面积成倍扩大，蔬菜总产量由1949年的2.1亿斤增长到5.8亿斤；生产冬季蔬菜的温室从838间增加到3,447间；阳畦发展到25,397个，比1949年增加4.2倍。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几十年来首都城市建设事业和郊区农业生产，农村经济的发展，足以证明我们的土改政策是从郊区实际情况出发制订的，是符合首都城乡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的。其根本点就是着眼于发展生产，解放生产力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历史是最公正的见证人。

带为宛平县一区，区委书记是王振江，区长是任树林。这个区由于日本投降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接管，环境仍很残酷。区里的同志多是隐蔽活动，天一黑过铁路进行工作，拂晓前回到铁路南隐蔽起来，或者在真正可靠的基本群众家落脚。在这残酷的环境里，干部们不怕艰苦，不怕疲劳，一个村一个村的进行工作。一面与当地地主豪绅和有权势的人取得联系，区别情况，达到团结利用控制的目的；一面深入群众对贫苦的工人、农民进行细致的阶级教育，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说明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才能翻身求解放。这样，我们的工作开辟到丰台的头圈、二圈、三圈和草桥一带。并在群众基础较好的村，如羊坊、郭公庄、汾庄等村，初步着手建立起我们的群众组织。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宣传共产党的各项政策，在街头上粉刷减租减息和各项政策标语。县里在庞各庄召开选举国大代表会议时，这个区有两名代表参加。后来听说代表给国民党杀害了。

庞各庄位于北平南面，距北平七十华里，是一个有一千多户的大镇，号称京南第一镇，也是平津战略重镇。县委、县政府进驻庞各庄后，便根据“五四”指示精神和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在减租减息的基础上，在全县开展以清算复仇、严惩恶霸为中心的土地改革运动。通过土改建立民主政权。运动开展以后，镇压了一批民愤极大的恶霸地主和汉奸。同时，对一般地主，召开群众大会，发动群众控诉他们剥削人民、欺压百姓的罪恶，勒令他们交出浮财，把土地分给贫苦农民。通过群众斗争，沉重打击了地主阶级势力，推动了这一地区的各项工作的开展。随着土地运动在各村的深入开展，许多贫雇农翻了身，分到土地的农民兴高采烈地唱着“大翻身呀，大翻身，挖掉穷根扎富根，富根长成果木树，果木好比翻身的人，天下农民是一家，贫下中农团结一条心，坚决消灭封建剥削，老百姓从此作主人。”是啊！多少年靠租种地主土地生活的贫苦农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土地，能不高兴么！大家分到了土地，更加拥护共产党，不少人踊跃参加农会和民兵组织，生产积极性十分高涨。我们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在各村进一步扩大党的基层组织，民主选举村政权，进一步发展和巩固了工、农、青、妇会等群众团体。

—

日本投降，改变了整个形势。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和平谈判，也为了在争取和平过程中，揭露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发动内战的真面目，以利团结教育广大人民，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到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签订了“停战协定”，美国也发表了不赞成中国内战的声明。

但是，“停战协定”的墨迹未干，国民党反动派便不断挑起事端，美国所谓不赞成中国内战的声明，只不过是它用来帮助国民党反动政府准备反革命内战施放的烟幕。住北平的国民党军队，不断派小股部队穿过北平铁路停战分界线，向我解放区进犯。1946年春，位于停战分界以西二十华里的我军驻地辛庄，遭到敌人偷袭。在谈判时，我方代表严正指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在铁的事实面前，国民党反动派不得不承担破坏停战协定的罪责。

1946年4月上旬，庞各庄突然开来一辆美国吉普车，里面坐着三位美国佬，打着“军调处”和“三人小组”的旗号到处乱窜。我侦察员见其鬼鬼祟祟，令其停下，他们抗命不从，我军便鸣枪警告。他们见势不妙，妄想夺路逃跑，被我军在天宫院强令截住，押回庞各庄。

后经请示上级，交北平军调处处理了。事实证明，这是美国方面有意干的一次不光彩的侦察活动。我解放区军民面对敌人的挑衅，百倍警惕，做好了保卫解放区，保卫胜利果实的准备。当时，从全国局势看，在所谓“和平”形势的背后，充满了战争气氛。在华北平原进行土改运动后，地主阶级势力蠢蠢欲动，伺机反扑。我国社会矛盾由民族矛盾转为阶级矛盾，因此环境变得比抗日战争更残酷，斗争也更加尖锐，给坚持地方斗争带来了更多的困难。当时阶级敌人造谣说：“八路军站不住脚了，怎么分的我们的地，还要怎么退给我们。”有的地主还跑到北平和铁路沿线的县城组织还乡团，企图反攻倒算。如庞各庄反动地主崔恒亭、崔坛和反动资本家王镇南（伪商会长、南裕丰酒店老板）、杨希福等躲到北平城里一家旅馆里，多次召开黑会，秘密策划，组织还乡团，并与国民党勾结起来，窥测时机，反攻庞各庄。薛家营的恶霸地主薛永平也在北平组织暗杀团，秘密潜回村里。一夜之间，薛家营村的工会、农会、青会、妇会长都被杀害了。面对凶恶的敌人，县委坚决地执行了中央和上级党委关于以自卫战争，坚决粉碎蒋介石的进攻，要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在农村中坚定地解决土地问题，紧密地依靠雇农、贫农，团结中农，团结中间分子，孤立反动派的指示。除了继续进行土改运动外，在各村还组织起民兵武装，保卫胜利果实。同时还加强了对敌人的军事活动的监视，做好了应变的准备。

1946年5月，有一天，军分区得到敌人内部情报，国民党军队要在几天内进攻庞各庄。根据这一情况，军分区命令75团作好保卫庞各庄的战斗准备。驻在我县太子务村的北平工作委员会（领导北平地下工作和了解敌人军事活动的机构）的同志和我敌工人员都相继送来情报。这个情报得到了县委的重视，并立即向地委作了报告，同时，召开了县区主要干部紧急会议，刘浩同志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这次会议还决定，以县委为领导核心，以75团团长李德才同志为军事指挥员，组织党政军事联合指挥部。这时，地委又委派敌工部长徐英同志来庞各庄协助指挥。县委向全县人民发出了“紧急动员起来，做好准备，应付突然事变”的号召。为了保卫庞各庄，八千多名民兵和基本群众，携带着各种工具，从四面八方来到庞各庄，根据指挥部划定的区域，抢修工事。庞各庄周围的围墙，高二丈五尺，底宽一丈五尺，顶宽一丈，长达五公里，仅用了两天一夜时间就全部按要求完工。

县委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决定先转移县直机关和全镇的老百姓，给敌人留下空城，然后组织一支精干部队，狠狠地打击敌人。根据县委的决定，75团团长李德才、政治处主任徐升带领2营和特务连（有二门机关炮），还有地方干部和民兵，共四百余人，负责保卫庞各庄镇。在镇内，家家户户都已打通，房上房下连成一片，弹药、干粮和开水也都作了准备。75团1、3营由政委赵绍昌、副团长梁璞带领在外线随时准备接应，在运动中打击敌人，消灭敌人。

5月15日早晨5点多，住黄村国民党16军一部，配合当地伪军共千余人，仗着三辆坦克的掩护包围了我庞各庄镇。敌人密集的炮火一直打了四个多小时，才敢向村里蠕动。当敌人快爬到我军战壕时，我们的轻重武器一起开火，手榴弹和地雷在敌群中开花。不到二十分钟，敌人便狼狈后退。我军5连3排，乘敌人溃退混乱之机，冲出战壕，进行反击，缴获敌轻机枪两挺，步枪20余支。敌人的第一次进攻，就这样被打退了。

上午11点，敌人向我阵地发起了第二次进攻。敌人炮击近三个小时，将我军建起的70多个高房岗楼和突出的堡垒，几乎全部炸毁了。守在掩体里的我英雄战士和民兵，表现出异常的坚定和勇敢，信心百倍地等待着消灭敌人。下午3点，敌人炮火更加猛烈，同时，还有三

架敌机在空中盘旋，这时，我军发现南街口的敌步兵冲上来了。在这紧急关头，伏在房顶上的我特务连战士随着指挥员的命令，数百枚手榴弹一齐向敌群扔去，炸得进攻南街口的敌人乱了手脚，东奔西窜，退了回去。

下午4点半，东街口的敌人凭借两辆美式坦克做掩护向我军冲来，很快接近大街中心，坦克炮打得很猛烈，对我军的防御阵地形成了严重威胁。大家对这庞然大物的出现，正在束手无策的时候，作战参谋赵修芝跳进街心堡垒，端起机关枪对准敌坦克狠狠地打出一梭子子弹，敌人的坦克冒起了黑烟不动了。接着第二辆也被打得不动了。敌步兵失去了坦克的掩护，顿时乱作一团，在我军手榴弹的爆炸声中，没命地逃了回去。就这样，在敌人兵力数倍于我的情况下，我军指挥员英勇战斗，一连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战斗整整持续了两天一夜，我军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战斗结束之后，我军为了保存力量，争取主动，于5月16日下午4时撤出了庞各庄镇。

二

庞各庄战斗结束后，面对强大的敌人我们撤离了一些地区。敌人占领解放区以后，为摧毁我们党的组织和民主政权，一面进行大规模的清剿和扫荡，一面在铁路线和交通要道重新恢复建立日伪时期的许多地点，如庞各庄、狼堡、码头、刁窝、茨村等据点。并在所有大村修筑了碉堡，组织起还乡团，凭借这些据点，开始了对人民群众的血腥镇压和反攻倒算。其残忍程度令人发指，仅涿良宛三区就有一百一十人惨遭杀害。中堡村的七个村干部被敌人用铡刀铡死。冯元庄有一家被地主杀的仅剩一个老头。浑河两岸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在地主还乡团的武力威胁下，农民刚刚分到手的土地又被地主夺了回去，如石堡、玉台庄、求贤村，涿县的义和庄、里渠、刁窝、北蔡、古城、双柳树等，都是如此。田柳树的地主将其所有土地收回去，还强令农民补交一至二年的地租。刁窝地主周勇，让村里的抗属和农民会员，每户交玉米一百斤，腊月三十又强迫每户交两担至二十担粮食。还乡团的反攻倒算，致使许多贫苦农民大年三十外出逃荒要饭。双柳树地主郭庭复，不但收回土地，还强令农民拆毁自己的房并带着砖瓦木料为他盖新住宅院。北蔡村的地主张连登回到村里立即提高地租，逼令农民好地每亩交地租二担、花生二百斤，次地每亩交租黑豆一担，花生一百斤。他还私立公堂，凡交不起地租的，便被严刑拷打，逼得农民卖房卖地，卖儿卖女，有的给其扛活顶粮。

反动派的疯狂倒算和血腥镇压，并没有吓倒人民，相反，更激起了人民的仇恨，打消了对地主阶级的一切幻想，使人民更加看清了地主阶级的反动本性，于是，各村人民群众纷纷要求武装起来，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根据当时的形势，和人民群众的要求，我们于1946年6月15日成立了复仇大队，下设四个中队，大队长是张贝珍，副大队长是丁守仁，副政委是李润波。队员多数是在敌人疯狂扫荡时离开村庄的党员、干部、民兵和土改积极分子。他们中许多人的亲属惨遭敌人杀害，所以人人心里燃烧着复仇的怒火，打起来都非常勇敢。丁守仁、丁守信兄弟二人同时参加了复仇大队，他们怀着对敌人的满腔仇恨，英勇杀敌。这兄弟二人是回民，留土庄人，出身贫苦农民，在回民群众当中有一定的影响和号召力。丁守仁担任副大队长得到了回民战士和回民群众的拥护。在反扫荡中，有一次部队受到敌人的追击，撤到安次县穆庄村（回民村），由于回民群众的掩护躲过了敌人的追击。

县委在组织复仇大队的同时，根据当时的形势特点，制定了新的工作方针。主要是精兵简政，将老弱病残的干部和妇女干部转移到后方，留下党政军的精干力量，转入地下坚持斗争，并配合武工队，采取游击战术，打击敌人。一方面发动群众，在敌占区广泛开展政治攻势；另一方面集中兵力，打击蒋军武装和地主还乡团。同时，还要提高人民群众对敌斗争的勇气，坚定必胜信心。留土庄还乡队队长兰德友每天到各村征粮催款，十分嚣张，干了不少坏事。一天我军在东麻各庄、礼磕两村设下埋伏，兰德友带其喽罗十九人进入伏击圈后，我武工队员一齐开枪射击，仅打了十分钟左右，除匪首只身逃窜外，其余全部为我消灭，缴获机枪1挺，马步枪13支，子弹1500余发。

1947年初冬，我记得是我们部队战士刚刚穿上冬装，王凤岗以三个团的兵力配合涿良宛伪地方武装，企图封锁我军撤向永定河南的通道。王凤岗的一个主力团，沿永定河西北上到陶营一线集聚；王凤岗的16团沿永定河由北向南驻南北章客、赵村一线；另一团驻周安、永清交界处曹家务、姜知营一线。我支队（复仇大队改为涿良宛县支队）正好住在良乡地区的大陶村。这样形成了敌人沿永定河两岸对我们的包围圈，截断了我支队的去路。记得一天早晨7、8点钟的时候，我侦察班在窑上村东的西大堤上监视敌人。忽然发现南北章客方向有一个穿着美式夹克的伪军官及少数随兵过河。我侦察班沉着应战，立即设下埋伏。等到伪军16团副团长牛步云刚从冰河中走入我伏击圈时，战士们大声喝道：“交枪不杀！优待俘虏”！伪团长牛步云及其随兵只好举起双手，乖乖地向我军投降。当战士们押送俘虏到支队时，支队负责人李润波、丁守仁等同志对牛步云以礼相待，并交待政策，鼓励他们弃暗投明，重新做人。牛步云受到启发，交待了敌人兵力部署情况。根据敌人的交待，我们分析了当时的情况。如果我们向南出击，是王凤岗的主力7团，向东突击，则有王凤岗的16团堵击，怎么办？敌人虽然包围了我支队，但并未了解到我军底细。因为大陶村以南敌人主力驻陶营村，离我们只有七、八华里，如敌军知道我军底细，向北突击，南有7团，隔河有16团，往北是京汉铁路交通要道长辛店，形成四面受围，只要敌人向北推进几华里，我军就有被全歼的可能。根据这个分析，我们作出决定，即：利用初冬未尽落叶的茂密树林，出其不备，沿永定河堤北上，向金门闸前进。敌人来了，我则可以利用金门闸同敌人决一死战。结果，敌人未来，我军固守到天黑，绕到河东伪16团背后，当晚住在周家场，翌日直接穿插到大兴县界，避开了敌人的锋芒。以至敌人企图封锁我军的阴谋破产。

1948年8月底前后，县委为了打开局面，决定由副政委李润波、副支队长丁守仁，以及县委书记刘浩、县长阎占彭，带领支队两个连和支队部约二百余人，从永定河南过河，住河北大堤拐弯处辛庄村。当时，在阳家铺布置了一个排的兵力，作好了战斗准备，敌人侦察到我军驻地后，于一天上午开始调兵遣将，调涿县、良乡、宛平三个县的伪军，另有一个主力营，企图四面包围，消灭我军。下午一点多钟，我军尚未吃饭，正在将榆皮面条下锅的时候，接到我侦察人员的报告：敌人沿永定河东堤南下，直奔我军驻地而来。支队首长根据这一突然情况，进行了认真分析研究，认为我们有两条不利因素，一是敌众我寡，二是地形不利，前有追兵，后无退路。但也有很多的有利因素，最根本最首要的有利因素就是我们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再一条就是我们经过短期休整后，战士们磨拳擦掌，士气高昂，纷纷表示要为牺牲了的兄弟姐妹报仇；还有一条，我们不是孤军作战，还有大兴、永清等兄弟部队的支援。分析了这些情况后，坚定了打好这一仗的信心。经过短时间动员之后，决定由3连1排封锁大堤北头，阳家铺这个排封锁南头和东边，二连固守辛庄村北和东北部。兵力展开之

后，于某日下午2点战斗打响。3连1排在大堤北头，接连打退敌人几次冲锋。辛庄村北有一个大沙岗子，为控制这个制高点，敌我双方展开了一场激战。敌人不断增兵，我指战员英勇顽强，坚守阵地，不断打退敌人进攻。当时，武工队和地方工作人员也都参加了战斗。虽然我军兵力上处于劣势，但是，我军除了上述提到的有利因素外，还有武器装备也比较好，每排各有机枪一挺，六〇炮一门，有缴获还乡团的枪支弹药，子弹很充足。再加上采用了正确的战术原则，部队顽强战斗，敌人的许多次冲锋都被我军击退了。打到黄昏7点多钟，敌人屡攻不下，敌我双方处于对峙状态的时候，支队首长研究，决定集中优势火力，选择薄弱环节，向外突围。支队把机枪组织起来，以三挺机枪与六〇炮同时开火，战士杀声震天，以猛烈的炮火，打开了一个火胡同，最后从榆堡镇村南五里地的胡林据点以南沿永定河北堤胜利突围。这次战斗中，敌人死伤近百人，我军也有近三十名伤亡，李润波副政委也在这次战斗中光荣负伤。

我军撤出战斗，行至平大公路以东小黑堡村时，我大兴支队王绍基同志，率部队迎接上来，做为后卫掩护我们撤退。当夜我们住在永定河故道的泛区琥珀营村，大兴支队住在王力村，监视敌人。第二天，敌人发现我军行踪后，追击下来。下午3点左右，大兴支队长王绍基派通信员告诉我们：“敌人跨过平大公路以东追击我军。”在西有追兵，南有敌军封锁，还带着二十来个伤员的情况下，我们只有背水一战，淌过水深过膝的永定河，跨过泥沙滩，绕到安次县的安乐村。同时，大兴支队沿着永定河区北边，边战边走，掩护我们突围。当我们突破敌人沿永定河的封锁线，到达永清韩村附近的一个小村的时候，永清县大队姜保忠同志（现任天津市房管局党委书记）率部队也同时到达。李润波同志强忍着枪伤的疼痛，从担架上挺起身来紧握住姜保忠同志的双手，激动地说：“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对我们的支援。”真是有不可言喻的喜悦。

复仇大队，即后来的涿良宛支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不愧为人民的英勇子弟兵。它从1946年6月15日成立，到1948年2月，一年多的时间里，就与地主还乡团作战一百零三次，攻克了除主要干线外的全部还乡团组织。毙伤俘敌687人，其中包括生擒王凤岗部16团副团长牛步云，缴获了六〇炮2门，长短枪400余支，机枪8挺，子弹22500发。曾多次受到军区、军分区的通令嘉奖，县委授予支队“为民部队”的光荣称号。

三

经过土地改革，被反动地主还乡团反攻倒算，夺去的胜利果实又被夺了回来。这个阶段主要是与反动地主及其反动武装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斗争中，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我们的解放区一度由根据地变为敌占区，又由敌占区变为游击区和隐蔽游击的根据地。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的党和政府在武装打击敌人的同时，热情关心军干属和贫雇农的生活。经常通过访问，尽最大可能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如发放优待粮、优待款等。由于我们的党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是誓死捍卫人民胜利果实的，所以，我们的军队与人民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有一次，县委书记刘浩住在留士庄，正好敌人在留士庄扫荡。当时房东既要保护刘浩同志，又要支应敌人。没有办法给刘浩同志送饭，就在敌人不注意的情况下，顺着堡塋气眼向洞里投鸡蛋给他吃。还有一次，妇联一位女干部住在常各庄村一个老大娘家，正好敌人扫荡，去清查户口，这位女同志是由大清河南去的，经盘问，发现口音不对。敌人

指着这位女同志说：“一定是个女八路”。没等这位女同志回答，那位大娘便说：“他是我的儿媳妇，是从河南娶来的”。又加上这村是我们的两面政权，经保长应酬了一番，将伪军支应了回去，那位女同志安然脱险。

1947年9月的一个晚上，田忠同志和县武装部胡天民同志到辛庄工作后，住在该村浑河堤上一个军属家里。这家军属有人们、大娘和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当睡至将要拂晓时，村子被敌人包围。他们按照大伯指点的路线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跑到浑河西去了。凶残的敌人没有抓住他们，就逼问军属大伯，敌人什么也没有得到，就向军属一家下了毒手，一家三口被活活打死。敌人还不罢休，又把这个军属的房子烧了，还抢走了耕牛。事后查明，敌人这次包围是由于奸细告密，后来抓住了这个奸细，被我们处决了。

1947年秋，三区区长王建新带两个武工队员于某日夜晚活动后，回西麻各庄住下，拂晓时分，敌人包围了村子。他们刚刚躲到军属韩大哥家里，敌人就开始砸门，这时已来不及进洞，一场战斗眼看就要发生。韩大嫂迅速把他们拉到东屋，又在门口挂上了一条红布（农村生孩子的屋子通常挂上红布条），然后才沉着地去给敌人开门，并把敌人引到北屋去搜。韩嫂镇静地问敌人：“是不是还搜东房”？敌人见门口有红布条，只隔窗望了一下就走了。由于韩大嫂的机智、勇敢，使王建新区长和两个武工队员得到保护。

后来形势有所好转，我们根据毛主席在不同地区实行不同的土改政策的指示和土地委的具体部署，在大反攻后的新解放区，首先采取了中立富农，专门打击地主的政策。分大地主的浮财，分配地主的土地兼顾小地主等，逐步开展土地改革。农民尽管还有顾虑，但地主反攻倒算的事实教育了他们，提高了他们的阶级觉悟。一些贫苦农民听说要进行土地改革，非常高兴，奔走相告。他们找到我们，对我们诉说地主的罪恶，要求报仇。一些中农也说：“早先咱们对地主手软，地主对咱可是真狠啊！这回咱们不能再饶他。”石堡的农民自己组织起来，把五家大地主五顷麦子全部收割了。北蔡村做恶多端的地主张连登，曾多次杀我村干部，危害群众。我们根据群众的要求处决了他，并将他的土地和地里的庄稼分给了群众。

进行土地改革是我们党坚定不移的政策。当然，在不同的情况下运用的土改方法就不尽相同。抗日当中是减租减息，日本投降后则是以清算复仇和反恶霸斗争为中心进行土地改革运动。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进攻我解放区，地主反攻倒算猖狂，我们通过武装斗争给予坚决反击。1947年8月16日傅作义以10个师的兵力扫荡十分区中心地区，我们坚持在永定河北一手持枪，一手分田，连续搞了数十个村庄的土地改革。我在四区与区委书记冯士杰等同志一起，晚上在南各庄搞分田，天刚黎明，有五路敌人合击我们。他们自以为聪明，妄图把我们堵死在村里。其实，我们早已到青纱帐里休息去了。

四

蒋介石的军队在华东、中原、西北、东北各个战场上连打败仗，就加紧对平、津、保地区疯狂扫荡和野蛮控制，妄图巩固其在华北的战略后方。蒋介石还委任傅作义为华北“剿匪”总司令，接替孙连仲。在这个阶段，地处北平西南郊的涿良宛地区，进行了一场非常艰苦的占领与反占领的斗争。敌人进行频繁的扫荡清剿，在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使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使一些党员、干部、积极分子被敌人杀害，县、区里的领导干部也牺牲了不少。县委组织部长华黎在宋各庄开展工作，被敌人包围，村里的地道被敌人破坏后